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十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五六期 ——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4 b）

- | | |
|-------------------------------|--------------|
| 【亡灵祭坛】“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胡秀正之死 | 王友琴 |
| 【运动记愧】从娃娃抓起的残忍——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 刘晓波 |
| 向杨贞同志叩首谢罪 | 茅志云 |
| 【不堪回首】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 辛 洁 |
| 【历史资料】“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的来信及毛泽东的批语 | |
| 四位美国在华专家的大字报及毛泽东的批语 | |
|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 | |
| 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 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亡灵祭坛】

“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胡秀正之死

• 王友琴 •

胡秀正，1933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化学教师。1966年9月，胡秀正和丈夫一起因其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份问题”被驱逐出北京并被打被“斗争”。他们后来试图纠正对他们的这一对待以回到北京。1968年夏天，她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审查对象”，罪名是“企图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她先遭大字报“揭发”“批判”，又在几十人的会议上被迫“交代”她的“问题”，后来又被关押在学校里不准回家，即受当时所谓“隔离审查”。1968年8月11日，她被关押在学校中时，从五楼坠下身亡。她去世时35岁。

照片上的胡秀正，朴素，严肃，端正，一副典型的中学女教师的形像。她也确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普通的中学女教师。胡秀正195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升学。她毕业后先在这所中学当实验室管理员，一边在业余学校学习。她从1954年起在这所中

学当化学教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文革开始时，她已经有十二年教龄。她当时的工资是每月六十四元。她的丈夫也是中学教师，每月工资六十八元。他们有一个女儿。另外，他们赡养胡秀正的寡母及外婆外公。

在1966年5月，毛泽东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他又明确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还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个完全负面意义上的名称。胡秀正也不能例外。当时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受到批判。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胡秀正似乎不该成为教师中的“文革”的重点打击对象。她是普通教师。在这所学校的教师中，胡秀正不算级别高的老师。她没有上过正式大学，也算不上这所学校里的“学术权威”，“反动学术权威”是一个文革要打击的主要类别。另外，她年龄不大，1949年时16岁，不太可能有什么“历史问题”。她也并不是一个个性张狂的人。在文革中，一般来说，级别高、年龄大的老师以及个性突出的老师往往首当其冲受到迫害。他们会因其学术地位高而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斗争，或者因其教学历史长而被认为“历史上有问题”，或者因为好发议论而被认为“有反动言论”。这些人所受迫害的程度一般也更为严重。为什么胡秀正这样情况的人也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打击对象受到残酷整治以致身亡呢？

一，1966年：被抄家赶出北京

胡秀正的“问题”，起源于她的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份划分”。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是北京第八中学的物理教员。第八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相距大约一公里，同属北京西城区。他们在1958年结婚。1966年时他们住在师大女附中附近的教工宿舍里，他们的女儿当时三岁，“全托”在附近的幼儿园中，周末回家。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的父亲，住在河北省固安县牛驼公社五村生产队。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被划成了“漏网地主”，并被命令参加“坏蛋会”，也就是说，成了“阶级敌人”，成了“专政对象”。关于张连元的父亲是否地主，是否“坏蛋”，胡秀正去世二十八年后来笔者访问张连元的时候，他还能详细而流利地一口气讲述出他父亲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他不应该被划作“地主”。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共产党掌权以前，在1940年代，他父亲经历过不少事情并有起起落落变化。由于他父亲的阶级成份问题，在“文革”之后的1979年已经得到“平反”，所以他父亲1949年以前的历史上的种种细节，在今天已经没有关系，但是他讲得如此清楚而详尽，并且还很激动，这实在是因为当时关系重大。当他因为父亲的历史而被打被关被斗争，以致最后失去妻子的时候，曾不知多少次地思索和整理这些故事。他也曾被迫写了不少的文字材料为他父亲的事情“交代”“认罪”。所以，他把父亲的历史细节记得如此清楚。笔者发现相当多的文革时代的过来人有这样的特点：直到今天，他们对他们的父亲青年时代的历史，甚至记得比自己的历史还清楚，因为在文革中无比强调“阶级出身”，他们也因此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叙述父亲的历史，后来，对他们自己的经历，却可能没有需要回忆与叙述的场合。

在今天的情境中，人们对这样的陈述，会觉得是一些根本不相关的事情。不论张连元的父亲是否地主，是否“坏蛋”，又与胡秀正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她的丈夫的父亲。他历史上的种种事情，都发生在胡秀正认识他的儿子之前。胡秀正不可能与她的丈夫的父亲的过去有什么关系。哪怕张连元的父亲真是罪大恶极之人，又与她有什么相干？然而，不幸的是，这不是文革时代的判断方法。

这个离胡秀正远而又远的事情，在文革中成为致命的罪过，并且直接导致胡秀

正受迫害以致身亡。胡秀正被整死，她的罪名不是别的，只是“为反动公公翻案”，进而又被上升为更严重的“翻四清的案”和“翻文革的案”。按照文革的标准，“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要遭到严厉镇压。

1964年张连元的父亲被划成“漏网地主”之后，张连元向他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报告了此事。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向学校所在的西城区区委汇报了此事。张连元阅读了共产党的有关规定，认为“阶级成份”应是按照1949年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分的。按照这个标准，他的父亲不应该是“地主”。张连元曾经给中共华北局写信，请求“复查”他父亲的问题。

1966年6月，文革的领导者下令所有的学校全部停课从事文革。1968年8月，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并掌握学校大权，开始了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和杀戮。1966年8月5日，胡秀正所在的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打死。8月22日，张连元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历史教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成重伤，几乎死掉，后来终生残废，不能工作。红卫兵从校内打到校外，不但打学校的老师，也打社会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到张连元也被打的那一天为止，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打死了八个人。

那是1966年9月3日。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生产队的两个干部来到北京，要把张连元和胡秀正抓到他们的村子里去。他们的理由是这两个老师“反攻倒算”，为父亲“翻案”，“妄图翻‘四清运动’的案”。这指的是张连元曾在1964年后写信给共产党上级要求复查他父亲被划成“地主成份”这件事。这两个人到了北京第八中学，和八中的红卫兵取得联系。当时学校里红卫兵掌握大权。八中的红卫兵给生产队打了长途电话，证实了来人的身分。于是，初三（五）班的红卫兵把张连元叫到物理化学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张连元一进去就被劈头打了一顿。然后，从张父村子里来的两个人开始审问他。他们一边审问一边打他耳光。后来，红卫兵学生开始轮番用木棍、铜头皮带、绳子、扫帚等抽打张连元。在打张连元的过程中，曾有别的老师来到办公室，开门看到红卫兵正在打张连元。

有两个人试图阻止红卫兵打他。一个是实验员，名叫张良银。他对打人的学生说：“先不要打。你们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红卫兵把他硬推了出去。另一个是物理教师周国正。周老师是天主教徒，为此当时他自己也在被批判，处境不好。但是他开门看到学生打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打。”他试图劝阻学生继续毒打张连元。当时学校的人都有目共睹，从8月初到9月3日那一天，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打死打伤了多少人，都知道红卫兵的残酷无情。在那样的恐怖气氛中，实验员张良银和物理老师周国正出来为正在被打张连元说话，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无怪乎二十八年之后，张连元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俩的名字和他们当时说了什么，对他们俩心存深深的感激。虽然今天我们作为听众或读者，在对这两个人的敬佩之余，还是会为没有较多的人这样作而心感遗憾。但是，我们也因此更要记得他们的名字。在一个恐怖的时代，他们作了不平常的事情。他们勇敢，他们仗义，在同事朋友落难的时候，当别人收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尽管环境如此恐怖，他们伸出了他们的手，他们作了努力来试图制止罪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否还记得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当时并不想当英雄，但是他们完全有理由为当年所作的感到自豪。

9月3日，张连元被打了一整天。红卫兵打他耳光，用打了结的粗绳子、扫帚和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抽他，用车床上的三角皮带敲他的脑袋。他们强迫张连元跪下，他们把脚踩在张连元的背上，左一下右一下地打他。张连元在看不见打人者的情况下，精神极度紧张，猝不及防。后来，他们又强迫张连元腿直著，身体弯成九十度，头仰起来，头上顶著一个罐头盒。他们打张连元，还不许他动，不许罐头盒

掉下来。罐头盒一掉下来，就更凶猛地打他。他们打累了，在一旁休息，同时强迫张连元弯腰仰头头顶著罐头盒。时间一长，张连元的整个下身麻木得失去了知觉，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他们狠命打他，但是他的腿动不了。他们觉得很开心，一边毒打，一边狂笑。整整一天，他们不给张连元喝水，也不给他吃饭，却找来了一块非常肮脏的窝头，外面是乾裂的长了毛的，可是里头却象浆糊一样，又酸又臭。他们强逼张连元吃，不吃就打，吃慢了也打。有两个红卫兵拿著民兵训练用的木枪要捅死张连元。张连元想，他也要被打死了，就象已经被打死了的同事华锦和那些他不知道姓名的校外的八个“牛鬼蛇神”一样。他们之中有的人就是被木枪捅死的。但是一部份红卫兵认为应该把他送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处理，说：“别打死了。留给村儿里的人打吧。”晚上，红卫兵把张连元一个人锁在一间屋子里，还跟他说：“不许逃跑，要跑抓回来打死！”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开门，一边开锁一边说：“准他妈的死了。”

9月3日，八中红卫兵还抄了张连元的家，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把他们夫妇的户口迁出了北京。9月4日，他们用张连元的钱叫来了一辆卡车，把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二人连同他们的全部家具和衣物等都弄到了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河北省固安县牛驼公社五村生产大队。到了那里后，大队干部又强令他们交出随身带有的一切财物，现款、手表、钢笔。到了村里，张连元和胡秀正被分别关押，不准见面说话，全天有人看守。在那儿，他们被打，被游街，被体罚，在斗争会上被斗。胡秀正也曾经被戴了高帽子游街。当地的一个干部告诉他们那里的中学红卫兵如何打人，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了，然后威胁他们说：“再不老实，就把你们交给中学的红卫兵。”当时，中学红卫兵打人最凶，而且最无顾忌，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便打死他们所认为的“阶级敌人”。他们打死了人，最多不过被说作是革命中“难免”的“过火行为”而已。甚至直到八十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坚持这个说法。张连元和胡秀正没有办法，只好按照生产大队干部要求的口径写检讨认罪。一星期后不再有人全天看守。他们和其他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但是仍然没有行动自由。张连元的父亲被打得更厉害。他被施以一些残酷的刑罚。有一次，他被强令在立起的板子上跪了一整夜，不许动一动，也不许上厕所。老人被折磨得几次要自杀。

张连元的遭遇告诉我们，一，“翻案”被当作可以被打死的“罪名”。张连元在学校原来还不属于“牛鬼蛇神”，但是当村子里来说他为父“翻案”，红卫兵立即开始毒打他。他既不能作肢体自卫，也不能作任何自我辩护。二，在1966年9月3日，在北京红卫兵已经造成大量伤亡以后，红卫兵依然把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暴行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有恃无恐，手下无情。三，一些红卫兵用非常恶毒的方式来折磨残害人，以打人取乐，一任邪恶的愿望发泄，这种恶意根本不是用“革命理想”能解释的，比如强迫张连元弯腰仰头顶罐头盒，强迫他吃霉变的窝头，都是这类例子。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有十万人在被斗争被游街被抄家被打以后，又被迁出户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像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一样。他们中有些人在北京的火车站上或者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又遭到毒打，甚至在车站和火车上被打死。这是文革领导者的重大行动之一。这一行动清洗了北京城。尽管被驱逐的人数有十万之多，尽管比例达到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一事件确一直未被报告，这一数字也只在“内部”知道。当时的媒体没有对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报导。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字记录，只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布的一项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纸“通令”，即所谓“第四号通令”。这一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七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给出路”。这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

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1966年8月29日发布，就象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权力，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不到两星期以后，9月11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又发出了“第八号通令”，其中写道：我们要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之一。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通令”，在那时给了他们可以把胡秀正夫妇驱逐出北京的权力。这两个“通令”都不长，但是这些文字背后，是十万人的悲惨遭遇。胡秀正和张连元身受的灾祸，仅仅只是这些文字导致的后果的冰山一角。

二，1967：所谓的“翻案”活动

张连元和胡秀正被关押在村子里的时候，他们几次设法通过胡在北京的妹妹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共北京新市委写信和打电报，请求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信都被转到了中共华北局，又被转到中共天津地委，接著又被转到固安县委。这是当时对这种信的常规处理方法。张连元和胡秀正设法请求固安县委不要把信再转给公社。但是固安县委仍然这样作了。这样的把上告的状子层层下转的处理方式会导致什么结果，每个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想见。这样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即把告状信转给有权力的被告，写信人请求解决的问题不但不可能得到解决，还会遭到更大大报复性迫害。实际上，这也就是决定用这样的方法处理“人民来信”的人的本意。他们并不打算帮助人民解决问题。可是普通人没有别的办法，仍然抱着侥幸心理投寄这类信件。

张连元和胡秀正有个三岁的女儿，被留在托儿所里。他们被长期扣留在村子里，不许他们看望孩子。直到这一年的1月13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在一再请求之后，胡秀正终于被允许回北京看孩子。随后，她把自己的户口要了回来并落在了北京。这时，她开始设法要把丈夫从农村弄回北京。她曾经去“人民来访接待站”请求帮助，未有效果。她又想别的办法。在现存的材料中，有一张1967年1月13日由北京邮电医院门诊部开出的诊断书。胡秀正给生产大队的两位党支部书记写信，说她生病，她的母亲病重住在医院里，她的孩子也病了，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忙于文化大革命，她无法要求学校里的同事帮忙。胡秀正以这些为理由，请求书记准许张连元请几天假，回北京一趟，把女儿带到村里去。经过多次交涉，张连元得到五天的假，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张连元没有再回农村。但是他的户口还在农村，他的全部家具衣物也在那里。那边拒绝给他户口，也不还给他从他家运去的家具衣服等东西。这时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半年以前能有权打死人的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由于其领袖人物多为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时随著他们的父母被冲击清洗，在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运动中，他们失势了。1966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指示，不准私设公堂打人，私设拘留所关人。其实，这种“私设公堂打人，私设拘留所关人”的情况已经在北京公然实行了三个多月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人，试图以按照政策他们不属于应被驱逐出北京的人为理由重回北京。他们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饱受折磨，被驱逐到农村后，作为“阶级敌人”也无处安生。他们的境况十分悲惨。可是，紧接著，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份“布告”，（这时军事管制委员会执掌很多有关的权力），再次重申

肯定1966年夏天红卫兵的“遣送”行动，不准被遣送的人返回城市。这份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会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份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北京的街上到处贴著这张“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这时候，张连元住在北京没有户口，地位岌岌可危。到了五月初，张连元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当局宣布动员张连元遣返。张连元去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第五科，谈他的情况，交了材料，要求不走。分局强调他的户口不在北京，就应该离开。北京有特别严格的户口制度。在当时的北京，没有户口，不但不能得到定量供应的粮食以及不能工作赚钱，而且根本不准居住。到各家“查户口”是当时常有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被注销北京户口驱逐出北京，这是对“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的待遇，得到这样的地位，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户口”对一个人来说性命交关。胡秀正和张连元为恢复张连元的户口而拼命奔走，是十分自然而且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们恢复张连元户口的努力始终未见效果。直到胡秀正因为“翻案”被“隔离审查”时，张连元仍然没有能在北京恢复他的户口。相反，他们的努力导致了他们受到新一轮迫害。在1966年，他们的罪名是“翻四清运动的案”。在1968年，他们新增加的罪名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两个人都因此被“隔离审查”。胡秀正在“隔离审查”中身亡。张连元活了下来。张连元的户口直到1969年7月才又在北京恢复。其时，胡秀正已经去世近一年了。

在被二次“遣返”的可能性的威胁下，1967年5月间，张连元写了一份材料，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这份材料由张连元和胡秀正两个人署名。他们在材料中尽可能使用了一些当时可以找到的“理由”。他们说他们都是普通教师，属于文化革命所强调的“群众”，而不属于这一“革命”的打击对象。打击群众正是当时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手段。他们由此指出不还给他们户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另外，当时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因文革运动发展而也受到批判，他们因此指责是这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了他们一家。胡秀正也曾经和张连元一起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接待站”谈话并送了这份材料。他们也给江青等文革领导人写过信。他们的燃眉之急是要让张连元的户口转回北京而不是被驱逐到农村去。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可能反对文革，只是希望尽可能从文革的宣传中找到一些理由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他们夫妇的行动后来被叫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其实他们所作的，只是试图翻他们自己的案，他们试图说明他们不应该受那样的惩罚，而不是要否定文革的定案的标准。甚至他们自己就没有一个正式的“案”，就是在文革的第一年，两个村子里来到干部和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将他们毒打后强行送往了农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法律上的立案的手续，也从未有过审判和定案。（当时被打死的数千人和被驱逐的十万人，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翻案”的意思是不同意已经定下的案子结论并试图改变。然而在当时，很多案子根本没有定过，或者是定得很草率的，特别是没有容许当事人为自己辩护。比如张连元的父亲的成份，据说“四清”工作队三榜定案都不是地主，但在工作队离开前的前一天晚上宣布他是地主。在这

种情况下，相当多的被定罪的人或他们的家属会提出对他们的定罪的不同意见。他们并不是反对定罪的标准，而是提出他们的案子不符合那些既定标准，故而提出申诉。这从法律程序来说完全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但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这种申诉就可能给申诉人带来惩罚。比如，在1957年，有的人就因为对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提出申诉而受到处分。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不是因为他们有新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的“翻案”本身可以成为罪名。文革中的一个特别情况是，在1966年10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始之后，有大量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被“打倒”了。于是，有的过去被这些领导干部定罪的人想要利用这个种会来宣称他们过去受到的处分是错的，从而改善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在1966年秋天，一些因为批评在1966年6、7月间掌管学校的“工作组”而遭到批判斗争的学生被平反甚至成为官方认可的“左派”之后，一些别的受到迫害的人也开始想要平反。但结果是，除了这仅有的极为少数的一类人以外，别的人为自己平反的努力都被称为“右倾翻案风”甚至“反革命翻案风”而遭到严厉镇压。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的一个重大转折，结果之一是把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所有党政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在台上的时候受迫害的人就没有问题了，更不意味着迫害的原则被否定了。1967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文件，编号为“中发（67）325号”，标题叫做“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的规定”。这个文件说：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乱动。

有了这个文件，“翻案”正式成为罪名。

三，1968：死于“隔离审查”

1968年春天，一个新的运动开始了，名叫“清理阶级队伍”，后来被简称为“清队”。根据当时的指导性文件，“清理阶级队伍”的预定目标是“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重点是审查干部和教员。“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中迫害人最多最狠，时间也最长的一次运动。之所以能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运动是由上而下相当有组织地进行的。在上面，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详细指导如何搞这一运动。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上的一份材料上批示：

文元同志：建议次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握看过的同类材料中，这件是写得最好的。毛泽东，5月19日。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为“519”指示。姚文元送的这份材料标题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二者一起作为“中发（68）74号文件”下发。这份报告里，提到了这个厂的“阶级敌人”有数十个。后来，毛泽东的中央警卫部队8341部队还整理了一整套“经验”，下达到每个基层单位，包括农村的生产大队。全国的每个单位都开展了这个运动。各地在文革中成立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掌管审查谁，关押谁，开斗争会斗争谁，以及最后的“定案”和“处理”。毛泽东给“革命委员会”命名并明确制定了“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也就是说，共产党和政府不分，行政和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分，监狱和行政部门不分。在文革前这些部门就不分清，但是从来没有像文革中那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成一体。一个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关押它的

教员和职工。1968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了1966年红卫兵杀戮之后发生的最大的一场对人的迫害。

在“清队”时期，有两个特别的词语成为常用的：一个是“专案组”；另一个是“隔离审查”。各个单位都建立了一些“专案组”，搞“审查对象”的“专案”，也就有相当一批人成为“专案组”成员，他们那时的专职工作就是审问和调查被“清理”的对象。被审查的人可以被“专案组”关押在单位里，不得自由行动，不得回家，叫做“隔离审查”。很多被立“专案”的人在这种校园监狱里被关押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在那一时期，全国的每个单位都建立了这样的关人的地方。

所谓“隐藏的”的“阶级敌人”有两大类，一是“历史反革命”，意思是在历史上有过“反革命”活动的人，另一是“现行反革命”，意思是当时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当时停课停工，就是要“挖”这两种“反革命”。每次“挖”出来一个，就当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挖”出的“敌人”越多，功劳越大，所以各“革命委员会”都要尽量多“挖”，以显示其革命性并且邀功。1958年的“大跃进”中有很多领导干部夸大粮食亩产量，但粮食是吹牛吹不出来的。这一次，把人硬弄成“反革命”，却比夸大粮食产量容易得多。一时间，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以被当作“反革命活动”被追查。

在文革的前所未有的高压恐怖和严密控制下，从事真正的“现行反革命”活动是极其困难的，从而也是极其少见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在那时“挖”出大量的“现行反革命”来。当时“挖”出来的“现行反革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私人谈话或者私人通讯以及日记中说过写过些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东西，另一类是试图减轻或撤销自己过去受到的惩罚，被叫做“翻案”。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68年春天，张连元和胡秀正因为“翻案”在各自的学校中被攻击。胡秀正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列为“清队”的打击对象。胡秀正在学校被贴大字报。大字报攻击她“为反动地主翻案”，“翻四清运动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如1966年夏天，她的丈夫受他父亲的牵连，她又受她丈夫的牵连，成为新一轮整人运动的靶子。除了要接受“专案组”的几个成员的反复盘问之外，她还被要求去学生的班里一次又一次地“交代问题”。当时学生依然不上课，正在等待“分配”。学生中的积极份子成为“专案组”成员，一般的学生则被组织起来一上午一上午地听被“清理”对象的交代。胡秀正的“交代”，不断被听众高喊的“胡秀正必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断。

以中学生的年龄，对于从1949年开始的“划分阶级成份”不甚了了。但是十六七岁的学生也具备推理能力。胡秀正有什么大错？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给上级党委，要求复查父亲的问题。然后她和丈夫一起被斗争并且被抓到农村，他们家里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她的丈夫没有户口。她不得不起来要求改变这种处置。如果说她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行动是“翻案”，是“反革命”，因而应该被惩罚被斗争，那么就意味着她只有接受1966年的那个处置，那样她也没有活路。而且，也没有人来说明1966年对于他们夫妇的处置是正确的，是革命的最终判定。怎么能这样不给一个人活路？但是，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人对于胡秀正成为审查对象之事提出疑问。在大会小会上，对胡秀正的质问和咒骂声势汹汹，争先恐后。那些表现积极的人的动机可能相同又不同。有的人后来因参加“专案组”而“分配”到较好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只是随大流。但共同的是他们都努力显示出他们非常激烈非常“革命”非常愿意和“反革命”作“斗争”。

由于张连元那时不能跟胡秀正见面，张连元无法知道她所受到的“斗争”的细节。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次，学生被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组织起来斗争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胡志涛48个小时，学生轮流睡觉休息，胡志涛被连续“斗争”了48个小时。这样的“斗争会”，在当时是被当作功劳和成就来宣扬的。和1966年不同，1968年的“清队”一般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人活活打死，但是这类长时间的“斗争”和“审问”，仍然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另外，在关起来的门背后，大量使用体罚如罚站罚跪等等，也是公开的秘密。夜半审人是常常使用的被认为可以逼出口供的有效办法。还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熬鹰”。有两位老师，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所有要他们承认的罪状，甚至还添枝加叶说出种种故事，如他们如何当特务，如何搞破坏等等，终于被允许睡觉，然后，他们再来“翻供”，说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这个学校的一个19岁的女学生参加这种深夜审讯时，虽然是审讯别人，也因劳累和恐怖气氛而昏厥倒地。

在1968年6月，张连元写了检讨，检讨他没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检讨了他给上级写信的“动机和目的”。胡秀正也写了几份很长的检讨，承认自己的过错：不该对于她丈夫的父亲的生产队做的政治结论有疑问，不该在被揪到村子里以后对此心存不满，不该写信要求帮助。她一再表示认罪，一再检讨自己的“阶级立场错误”。这些检讨写得非常认真细致诚恳。她忍耐了那么多的侮辱和折磨之后，又做了极大的努力，试图把自己改造成成为那些“斗争”她的人要她变成的那样。但是，她的努力没有被接受。对她的斗争继续升级。

先是她的丈夫在北京第八中学被“隔离审查”。8月初的一天，张连元终于获得准许回家了。但是，他刚能回家，紧接著胡秀正又被“隔离审查”了。他们的一个邻居，也是胡秀正学校里的同事，晚上来通知张连元，说胡秀正不能回家了，要张连元给粮票和钱，带给胡秀正在学校里买饭吃用。8月12日下午五点，北京第八中学的领导通知张连元说，胡秀正自杀了。他们说胡秀正是在8月11日自杀的，是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生宿舍的五层楼上跳下来的。

尽管张连元的家离学校很近，张连元在妻子死了一天之后才得到死讯。他抱著孩子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胡秀正的尸体已经被从宿舍楼旁边移到了围墙边的一个僻静角落。她的身上盖著一片旧草袋，一只脚露在草袋外。师大女附中当局召开大会，声讨胡秀正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她在死后受到“以叛党开除党籍处理”。学校的几个老师把她的尸体送去了火葬场。张连元收到了胡秀正在“隔离审查”中的一些遗物，是一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笔记和检讨书的草稿。遗物中没有遗书，也没有写到任何悲观的或者跟自杀有关的念头。张连元一直不相信她是自杀的。他想如果她自杀，会留下遗书给孩子和他。他们唯一的女儿还不到五岁，如果她自杀，她一定会留话给孩子。他觉得她不可能自杀。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他深深地了解她。她是坚毅的女子，很年轻的时候就独立工作，承担了赡养家庭的经济重担。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们一起经受了暴力和恐怖。他们一起被绑架到村子里，并在那里被斗争折磨。两个月后她设法离开了那里，并又设法让他也回到了北京。她是勇敢而有韧性的人。文革开始后的两年以来，她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灾难，她可以再忍受下去的。她死的时候，她是被“隔离审查”的。她的家人亲友不知道她在关押她的地方经受了什么。她被打了吗？她被侮辱了吗？她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她的亲人全都不知道。张连元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从隔离审查室拿回来的每一片有胡秀正笔迹的纸片，不能发现任何自杀的征兆。张连元从来不相信胡秀正是自杀的。他说他只是找不到明确的证据。

他当时根本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寻找证据。胡秀正死之后，张连元又第二次被“隔离审查”。在北京第八中学，他和另外一些老师，一共至少有九个人，被关在一起。地上铺了些稻草，一个挨一个地睡在那里，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这些被“隔离审查”的人被押着在毛泽东的像前向“请罪”。被“审查”的人也常常挨打。张连元曾经被打。在被关期间，他们被要求每天写“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还被强迫互相揭发。在他被“隔离审查”期间，他和胡秀正的孩子又被

留在托儿所里，连星期天也在那里跟着值班的保育员。

张连元在北京第八中学被一直关到1969年春天。有一天开会，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他可以回家了，可以参加老师的活动了，不再受隔离了。用当时的文革术语说，他被“解放”了。也像当时的规则，在被“解放”之前，他必须写一份很长的“自我检讨”。所以，为他的被“解放”，张连元又写了长篇检讨。他保留了他的“检讨”的底稿，所以现在还可以读到。在检讨中他又从头“交代”他的“家庭问题”和“翻案问题”，并且，“感谢”“党和毛主席”对他的“挽救”。

张连元的全部“罪状”，就是写了几封申诉信，他想让共产党上级了解，他的父亲在1949年的前三年不是地主，后来，他想让文革的领导人知道，他不该被驱逐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因为这些申诉信，从1966年到1969年，张连元被毒打，被侮辱，被长时间关押，最残酷的，是他的妻子被害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的年幼的女儿的童年饱受惊吓，而且永远不再有母亲了。在他被关押的时候，他写了无数份检讨，认错，认罪，诅咒自己。最后，为了被释放，他还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胡秀正之后，有两位教师自杀身死。他们是语文老师周学敏，历史老师梁希孔。周学敏老师温文尔雅，她的语文教学法曾经在文革前被推广，她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梁希孔诙谐风趣，他的历史课上笑声不断，而且学生都说学到了很多知识。恐怖的“清队”摧毁了他的幽默感和一切。在北京第八中学，青年教师高家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起来，在1968年秋天自杀。

不只是在胡秀正和张连元的学校发生了这样可怕的死亡。在别的学校，也是一样。根据笔者的一项涉及上百所学校的调查，在调查涉及的北京的中学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受“审查”而自杀的还有：在清华大学附中，体育老师赵晓东跳楼自杀。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某被打死，炊事员王厚跳河自杀。在北京景山学校，语文老师于共山和季新民自杀。在北京二龙路学校，物理教员张放上吊自杀。在北京第四中学，语文老师刘承秀用剪刀自杀。在北京第五中学，俄语教员何光汉自杀。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被关押在学校时，以头扎入贴大字报用的浆糊缸身死。在北京51中学，体育教员汤聘三自杀。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校工马铁山自杀，副校长王玉珍和丈夫一起自杀。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两位女教师孙历生和方婷之自杀。

自杀，在“清队”时被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被诅咒为“死有余辜”。死后还被开“斗争会”批判。胡秀正的“幸运”只是她的尸体未被弄到会上来再次“斗争”，但是有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971年林彪死了之后，处理人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1973年，中共中央有文件说运动中自杀的党员不再以“叛党”论处了。由此，胡秀正有了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说经审查胡秀正没有问题，“故不予以叛党开除党籍处理”。但是这句话是从她在文革后的“平反结论”中转引来的。当时的两次结论，没有给予家属书面材料，只是念给张连元听过，所以现在无法引用。再后来，在毛泽东死了两年之后，她的因为“翻案”而成的罪案才终于翻了案。1978年，胡秀正得到了“平反”。她的追悼会是1978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开的。其时胡秀正已去世整整十年。

张连元的父亲，也在1979年得到解决。先是“摘帽”。几经周折之后，他的“阶级成份”不再是“地主”而被确定为“工人”，他也由“摘帽”改成了“撤

帽”。

四，谁害死了胡秀正？

在1978年的“落实政策”过程中，文革中间由“专案组”整的材料和被审查者的“结论”等等都被从人事档案中抽出烧毁。这些材料当时从来没有给过被整的人一个副本，被整的人从未看到这些对他们生死攸关的文字。但是这些材料在1979年由人事干部拿出后，直接烧毁，仍然不准受害者看到内容。在北京第八中学，张连元作为两名教师代表之一，见证这一烧毁文革整人材料的烧毁过程。仅仅一个中学，这样的材料就有整整两个标准尺寸的大麻袋。麻袋里的纸片被掏出来直接投入锅炉，很快燃烧成灰。但这些纸片曾经整死了人，没死的也被整脱了几层皮。张连元也曾经去胡秀正的学校要求查看胡秀正的案卷。那边人事处的干部告诉他，材料已经都销毁了，为了“避免后患”。

于是，张连元拿到的只是一纸的盖有“中共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支部”红色图章的“胡秀正通知平反决定”。这个决定说：“1968年8月11日，胡秀正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迫害，不幸逝世。当时强加给胡秀正同志的错误决定和一切诬陷之词，应予完全推翻，给予彻底平反。”这个决定的日期是1978年6月15日，在毛泽东死了近两年之后。

指导“清队”的中共中央文件，都有毛泽东的批示或者“圈阅”。这些文件详细指导如何“斗争”，一一“传达”到基层。但是在文革后的此类“平反”文件中，按照统一口径，都说成死者是“受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迫害”。这个决定甚至也没有说“当时”迫害胡秀正的“决定”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实际上，“当时”甚至也没有给胡秀正的家属一个正式的书面的说法。“当时”的种种做法害死了胡秀正，却未留下任何记录。

文革以后，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北京市，有3,000人自杀，200人被打死。没有给出准确的数字，也没有给出受难者的名字。而且，也从来没有让普通的人们或者历史学者了解这个数字。3,200人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个数字的数量级是缩小了的。从现在找到的一些单位的局部的死亡密度来计算，在北京一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死亡的人的总数可能比三千二百多得多。胡秀正，是这一文革中最大规模的整人运动的千千万万受难者之一。如果说胡秀正的遭遇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是她的主要“罪状”——“翻案”。胡秀正实际所作的，只是设法为她的丈夫把户口恢复到北京；而她的丈夫失去了北京户口，是因为他为他的父亲的“阶级成份”说了不同意的话；而他父亲被划成“阶级敌人”，并不是因为真是有过土地的“地主”，而只是因脾气不好得罪了村里的干部。父亲的冤案发生在先，丈夫因为给父亲辩护而获罪，妻子又因为给丈夫辩护而获罪。辩护本身被认为罪行。这“罪行”又从“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而升级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最后，“翻案”这一“罪状”直接导致了胡秀正的死。

在文革时代的大规模的迫害中，一方面，把一些本来不是“罪”事情当成了罪，比如，批评了毛泽东，文革前的写在纸上的法律至少还并未说这是重罪，但是1967年制定的所谓“公安六条”就把所谓“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定为大罪。另一方面，被定罪的人不但不能为自己辩护，而且自我辩护会成为新的罪行，以至被当作“罪上加罪”。这种作法在文革前就有，在文革中更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前者给人带来了大难，后者又把入往灾难的深渊中推了一层。国家“专政”机器，有了这两个巨大的铁轮，横冲直撞，碾碎了无数普通人的血肉之躯和他们理所应有的生活。

退一万步说，即使胡秀正真的做过坏事，允许她辩护又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在法学理论上，关于辩护的重要性可以说出很多道理来。辩护是基本的人权之一。至于不允许辩护在实施过程中会导致什么，胡秀正的悲惨遭遇体现得很明白。

张连元后来再结婚，他的妻子是林则徐的后代，和他一起抚育了胡秀正生的女儿。文革的结束使胡秀正的女儿有了和母亲不同的命运。她考上了大学，又出国留学。1997年，她在英国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这时她的年龄和她母亲去世时相仿。她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一个人的生活原来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文革时代，从1966年9月到1968年8月，无论她的母亲胡秀正作了多少努力，还是无法逃脱那样的悲惨命运。

~~~~~  
【运动记愧】

从娃娃抓起的残忍  
——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 刘晓波 •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大陆对于文革历史的清理和研究，除了旨在洗刷自己的诉苦、并用苦难为自己贴金之外，并没有做出哪怕是差强人意的成绩。一场全民卷入的大劫难，罪责只有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来承担，而其他的人，似乎都变成了受难者和反“四人帮”的英雄。这种自我美化的倾向到今天还在泛滥。最近出了两本高干子弟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从北大到哈佛》和《红色季风》，作者都是有一定权力背景的老红卫兵，他们对文革的回忆仍然遮遮掩掩，把自己打扮成反林彪的先知，尽量美化自己的造反行为。

关于文革，不仅中共高层权力争斗的真相仍然难以还原，而且民众造反的真相也是大片空白。官方的压制固然是重要原因（比如封锁官方的文革档案、查禁某些文革书籍和逮捕文革专家宋永毅等），而当年的狂热参与者们的沉默，特别是老红卫兵们的沉默，则是更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共能够有效封锁的主要是官方档案，民间的文革亲历者的记忆难以全面封杀。

八十年代，写了《随想录》的老作家巴金发出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呼吁，他对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所作所为也有所反省；九十年代，老作家韦君宜的《思痛录》是一本充满自省和忏悔精神的回忆录。在书中，她在忏悔自己整人历史的同时，也向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老红卫兵们发出挑战，她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未见一个老实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更有意义的是，诗人郭小川的亲属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为尊者违，向读者公开了大量郭小川的日记，其中既有郭小川被整的资料，更有他整人和反复作交代作检讨的记载，为毛泽东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以这种方式纪念父亲的亡灵，在大陆已逝名人的家属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忏悔，有良知的活着的人替已逝者忏悔。

另外，余杰等没有亲历过文革的青年评论家，也高声呼唤忏悔精神，置疑红遍两岸的随笔作家兼大学教授余秋雨——为什么只矫情地感叹传统文化的失落，批判历史上那些出卖祖宗的不肖子孙，而不对自己在文革中充当御用笔杆子的历史进行反省。由此还引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笔战。由此可见，提倡对罪责进行忏悔的群体

，主要是历尽沧桑老一代和没有亲历文革的新生代，独独缺少文革时期造反的主力群体老红卫兵一代。

不能说那代老红卫兵中没有人自省过，支持青年一代提倡忏悔精神的老红卫兵徐友渔，写出了颇有深度的真诚自省《我的造反生涯》。但是，徐友渔的自省再深刻也仅是个案，比起当年狂热的全国性造反而言，实在是连九牛一毛都不及。最近，《南方周末》开辟了一个忏悔专栏，发过一些当事人的忏悔，但是还没有给人以震撼和深思的自省。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刚刚11岁，是个小学生，没有资格和机会献身于红卫兵的那种造反壮举，但是，不安分的天性使我的心中有着强烈的造反冲动。我大哥当时是高中一年级，可以造反和大串连，我曾央求他带我一起串连，他坚决不答应。虽然像我这种年龄小的学生，无法真正进入红卫兵的造反行列，因而也没有免费周游四方的资格，但是，当时的全民狂热会感染每一个人，连呼吸中都充满了如火如荼的造反气氛，人与人之间的残忍遍及全社会的每个家庭，学习毫不留情的斗争哲学也是从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学校频繁组织的批判会和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了以残酷为乐为荣的刽子手。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样的最高指示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这样的歌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都非常熟悉的。由此可见，很少有人能主动自外于当时的造反式革命，孩子也不能。我当时就特别羡慕大哥那个年龄层的红卫兵，无奈之下，也就只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生活范围内，模仿他们的造反行为，施展自己的残忍天才。

回想起来，记得最清楚的事是我在11—12岁时，曾经对一个和我奶奶同龄的老头儿残忍了一把。那老头叫尹海，当过几天国民党兵，后来开小差儿，却被解放军抓住了。据他自己的坦白交代，他天生耗子胆，一听到枪响就全身发抖，在战场上总是被长官用枪逼着冲锋。但是，当逃兵并没有使他幸免于难，49年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他住我家楼下，以走街串巷的理发为业，就是拿着个铁钹子和一根半尺左右的小铁棒，小铁棒插在铁钹子的两片铁之间，用力一撸，就发出一串金属碰撞的响声，颤音要好久才消失，很悦耳。他和我奶奶经常在一起聊天，可能是因为命运相同的缘故吧，因为我奶奶的本人成份是地主。文革前，我家几个男孩理发，奶奶都找他，有时他还不收或少收理发费。

文革来了，我奶被赶回了农村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和改造。老尹海没有农村老家可回，无处发配，命运就更惨。儿子与他划清界限，他被迫从家中搬出来，住在我们院锅炉房中一间几平米的长方形小屋里，又阴又潮，除了床，屋里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他也不能再给别人剃头了，只能以拣破烂为生。我们院还有一个叫“东方”的日本女人，与老尹海一起挨整，除了数不清的批判会之外，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跳忠字舞时，尹海与东方就在毛泽东画像前低头请罪。有一次，老尹海在批斗会上被打瘸了，想向组织上请一天假，不参加一早一晚的请罪，但是组织上坚决不准，硬是让几个小伙子把他拖来，跪在毛泽东的画像前。我们这些孩子也经常拿他俩寻开心。

从文革一开始，老尹海就被剃了大秃头，刮得锃亮。有一天我和几个伙伴边走边找乐子，忽然看见在垃圾堆中翻来翻去的老尹海的秃头，在阳光下愈发闪亮。我一下两眼放光，来了兴致，“这下有玩意儿了”。我摆手招呼伙伴们，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站在老尹海的背后，看着他手里拿着用废铁丝做成的签子，弯着腰在垃圾堆里翻来捡去。我突然高声大喊：“老尹海，把头抬起来。把犚儿头（额头）伸过

来，让我弹几个脑瓜嘣！”老尹海毫无准备，被我的当头断喝吓了一跳。他镇静了一会儿，站起身，回头望着我。当他想清楚了野蛮要求时，突然惊吓的恐惧变成了一脸无奈的乞求相。他低声下气地说：“三儿（我在家排行老三），我比你奶岁数还大，又是老邻居，以前总给你们哥几个剃头，就饶过我这一回。”我说：“不行！你个老反革命，还敢讨价还价？你越来越胆肥了（胆大）！一定要弹！非弹不可！”他又乞求了几句，看看把他团团围住的几个满脸凶相的孩子，觉得实在躲不过这一劫了，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实在要弹，三儿，我转过去，你弹我的后脑勺，行不？”我说：“你这个老家伙够滑头的，怪不得你历史反革命。不行，我今天非弹你的锃儿头。”其他几个小孩也跟着哄，把老尹海的装破烂的竹筐打翻了，七嘴八舌地说，“不让弹，你以后就别想再拣破烂了。”“老家伙，还想不想过好日子了？”

老尹海无奈，只好硬撑着伸过头。阳光很酷，他的额头布满渗出的细小汗珠，我只顾自己开心，全不知道这样的恶作剧，对于他是一种多么大的人格侮辱。他的岁数可以做我的爷爷，他为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头时给我讲笑话。可那时的我，丝毫没有想过老尹海以前对我家的好，更不会对他现在的悲惨处境有丝毫同情，所以也并不觉得这样欺负他有什么心理负担，只觉得好玩、过瘾、开心。

我看着他闪亮的布满汗珠的额头，活动一下自己的手指，运了运气，便狠狠地弹着他的锃头。“砰、砰砰、蓬蓬砰、砰……”，时而清脆、时而沉闷、时而节奏快、时而有间隔，时而因为他的脑门浸满汗珠，手指弹上去会打滑。一打滑，手指就吃不上力，就一定要再弹，而且要加倍多弹，作为对他的惩罚。我的手指弹痛了，指甲上滑滑的沾满汗渍，我就把手指在他的脸上蹭一蹭，然后接着弹，直到弹得手指有点儿发麻发木，方才罢休。其他几个孩子也跟着弹了，有时是几个孩子的手指同时落在他的脑门的各个部位。

老尹海再也没有任何乞求、反抗和躲避，只是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多次受年轻人的折磨和侮辱的经验告诉他，小孩或年轻人都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越乞求越反抗越躲避，受到的惩罚就越重，受侮辱的时间就越长。老尹海的驯顺使恶作剧的刺激和高潮很快就过去了，手指麻木的我们也丧失了兴致。当我们终于停了下来，他立刻低下头，不敢看我们，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收拾着散了一地的破烂。我们笑嘻嘻地冲着老尹海的背吐了几口唾沫，高声说了句：“这次便宜你个老反革命了”，便大胜而归般地扬长而去。

现在想想，他一定偷偷地流泪了，而且是老泪纵横。不光是眼泪，更是往心里流的耻辱。一个年近七十的、为孩子们理发的老人，一个和孩子们的长辈要好的老邻居，却被他看着长大的十一、二岁的毛孩子如此侮辱！人的心如果会出血，老尹海的心肯定渗出了血，而且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弹在他锃儿头上的时刻。

以后，老尹海一见到我们几个常在一起的孩子，大老远就冲着我们振臂高呼：“向红小兵学习！向红小兵致敬！向革命小将请罪！”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再以后，我们和老尹海还有了点儿交情。他靠捡破烂（主要是废纸）谋生，我们能帮他的大忙。天一黑，我们就拿着他的破竹筐去撕大字报，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把筐塞得满满登登。以此为交换，我们可以躲在他的小屋里抽烟。开始，老尹海很害怕，这要是被人知道了，非给他戴上教唆孩子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罪名，岂不是罪上加罪。好在后来这种事从没发生过。

再后来，等我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里时，老尹海已经死了。而现在，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罪责时，我的道歉和忏悔，老尹海已经听不见了！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此刻的我多希望真有灵魂不死，让老尹海的亡灵听到我的负疚之声。我没有资格乞求他的原谅，只求他能听到。

类似的残忍行为以及对残忍的自得其乐，我小时候没少干。这种行为与打砸抢、揪斗走资派的红卫兵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只因为政治贱民的身份，我就可以蛮横地戏弄和侮辱一个熟悉而善良的老人，当我稚嫩的手指头连续弹在老尹海的脑门上时，我不就是那些揪着熟悉的老师的头发的红卫兵吗？我在侮辱老尹海时，从未想到过我的奶奶也可能正在受着同样的侮辱，就更不用说顾忌老人的尊严了。

我们这些人，在一种野蛮的制度和教育之下长大，它崇尚暴力、培养仇恨、鼓励残忍、纵容无情，教给孩子们一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不拿人当人的残暴凶狠。在视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我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充当过刽子手和帮凶，谁也脱不掉责任，洗不清自己！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的这些年中，那些当年参与造反、在造反中进行迫害的人们，如果还心安理得、还粉饰历史、还不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还不以投身于废除这个非人制度的斗争来赎罪，那么，我们不仅还在延续着残忍，而且类似文革那样的全民残忍的历史还将重演。

事实上，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中，类似的残忍从未真正停止，尽管六四大屠杀的主凶中共政权，但是六四之后的整肃中，我们整体的驯顺和遗忘对于那些死难者来说，难道不是继暴政对肉体的屠杀之后的又一次精神的屠杀吗？难道不是另一种方式的残忍吗？现在，利用一个19岁的大学生和一个12岁的小学生被烧焦的身体，发动全国性的“校园拒绝邪教”运动，实质上是又一次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运动，教孩子们从小就学会残忍。

换言之，这种残忍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就在于我们从未发自内心地承认我们的残忍和罪责，并用根除这种残忍的实际行为来赎罪。负主要责任的统治者没有，负共谋责任的被统治者在整体上也没有。

□ 原载《民主中国》2001年四月号

∞ ∞ ∞ ∞ ∞ ∞ ∞ ∞ ∞ ∞ ∞

向杨贞同志叩首谢罪

• 茅志云 •

1966年初，我从部队复员到上海，被分配到四川中学——现又被改回“粤东中学”——任教。文革伊始逍遥自在，对学校里的派别争斗不闻不问。那时，学校根本没有读书上课，一味的“阶级斗争”教育。学校对复员军人比较信任，让我担任一个先进班级的班主任。

那时的班长王旭东同学是部队干部子弟，作风正派，能力强。我同他讲，班里经常开阶级斗争会，但对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认识、接触太少，正好学校里有个“地主婆”——数学老师杨贞没有批斗过，开个现场批斗会吧。说罢，还未经深入了解，也不向老师们询问，就让学生急匆匆将杨贞从“牛棚”里提出，带到课堂中央。

杨贞低着头，趑趄着碎步进来，以很快的动作拿起写着“地主婆”的木牌套到脖子上。木牌有相当重量，自然难受，她满脸痛苦……此时，学生们呼喊“打倒地主婆杨贞！”“杨贞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等口号。

我从未见过她：满头雪白，约近六十模样，矮小身材。这时，她透过深度眼镜，向上疑惑地瞅着我。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神，盯得我非常不自在……半晌，王旭东同学说了句：批斗会结束了，行了吧？！我悚然回头应道：好，好。

一回到办公室，发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直到下班时分，有位平时同我接近的老师，俯下身好心地：“学校里从没人去批斗过杨贞的，你怎么这样！”

不由得一个惊悚！我太不应该了。后来，我了解到杨贞同志的问题只是地主家庭出身；她本人一贯以教师职业为生，是个知识分子劳动者，工作认真，教学有方，待人处世都受人尊敬，是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一个偶然机会，我又知道杨贞同志是著名小提琴表演艺术家——“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首席琴师俞丽拿的母亲。对自己迫害艺术同行的至亲，如此毁人损名，我深感犯下难以宽恕的罪孽！

后来，我调去福州，再没有机会见到杨贞同志。我不能为一时的粗心大意而辩释，更没有理由开脱自己的罪责。我深深地向杨贞同志叩首谢罪！向杨贞的亲人俞丽拿叩首谢罪！杨贞同志那副从深度近视眼镜后瞅着我的眼神，历历在目，永远无法忘却……

□ 原载《南方周末》

~~~~~

【不堪回首】

文革中的童年往事

• 辛 洁 •

文革已过去三十多年了，对文革有记忆的人也大都已过了不惑之年。在这一代人的心里，文革是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将伴随著他们走过全部的人生。

我在一九六四年进入小学，如果文革自一九六六年算起的话，当时我只不过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文革前的两年小学生活，可以算是童年里仅有的一段心情舒畅的日子。记得那时我是班主席，是一年级第一批入少先队的队员，曾代表一年级入队的队员在全校讲话。又是学校歌咏队和舞蹈队的队员，曾在市工人文化宫表演过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的集体舞，在市里胜利堂剧院演出过“我有一把小花伞”，“我是小小的侦察兵”等节目。

不久文革开始了，学校里乱成一团，一夜之间美丽的校园给大字报覆盖住。楼道里，走廊上，任何可以张贴的地方都贴满了高年级同学攻击和揭发老师的大字报，学生们借此机会发泄种种平时对老师的不满。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无非是：X X老师借上课的机会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歧视学习不好的工农子弟……。大字报里充斥著对老师的嘲讽，对老师直呼大名或绰号，如教体育的丁正洋老师，改为丁大洋，教历史的马老师叫胖马，教体育的田老师则称田小头……。有两份大字报的内容我还记得，一份揭发教美术课的何老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竟然穿著高跟鞋来给学生上课，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份攻击教体育的田老师的大字报写道“田小头，老色鬼，看见女生嘻嘻哈哈，看见男生一本正经……。”

后来，听何老师哭诉著辩解“我为什么要买这些高跟鞋穿？这些高跟鞋都是当年为了向苏修还债时，国家生产的，后来苏修故意刁难退回来，国家号召老百姓去买来穿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我才买的，我那敢宣扬资本主义？”她真是一脸的委屈。工农干部出身的杨校长在被批斗后给下放到农村，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

究竟停了多久的课，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因当时让人激动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一些平时看来很和蔼的街坊老大妈被挂上了沉重的铁牌去扫地，铁牌上面用白色涂料写着一贯害人道坛主或逃亡地主婆之类的醒目大字。邻居周医生挂的牌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李工程师挂的牌是“反动权威”。平时在一起玩的孩子们，也不像

以前那样自然地说笑了。哭声、歇斯底里的骂声不时从邻家的窗户里飞出来。在附近上中学的菊香，一天从学校回来大义凛然地造母亲的反，只听她在街上叫道：“不要脸，不要脸，二嫁，二嫁。”她的母亲，人称郑小脚的郑妈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从屋里走出来，一面快速地移动著她的三寸金莲，一面喊“我到学校去找你的老师，看他们是怎么教育你的？”没过多久，她神色黯然地从学校回来了，她显然没有找到她想要的答案。在那个时候，谁又会给她答案呢？后来听说，菊香在家大骂母亲，嫁两个男人是资本主义的行为，而她正是郑妈妈第二个丈夫的孩子。听中学生渝生讲，她的同学，印尼归侨，因说毛主席穿军装的一幅彩印画像像个女人，被抓进了监狱，我们听了都吓得吐舌头。

风传红卫兵要来抄家，母亲吓坏了，赶紧销毁了有可能的封、资、修罪证。她烧掉了外公的毕业文凭：荆南师范学堂的毕业证书，因上面有前清光绪皇帝的徽号及什么印章之类的东西。外公留下来的一把牙骨古扇子上面有一首古诗词和签名，是谁传给外公也已不知，母亲用力地撕毁了扇子上的绸面子，只留下光秃秃的扇架子。一些可以换钱的东西，也赶紧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几个钱。一天下午我走在附近街上，一位陌生中年妇女拦住我问：“小妹，你知道前面那个女的是谁？家住在哪里？”顺著她的手指方向，远远看见一个走在前面的女人，那不是刚下班正朝家走的母亲吗？我吃了一惊，赶紧说：“我不认识她，她不住在这里。”那女人没有纠缠下去，悻悻地走开了。我跑回家告诉母亲，她想了很久，会是谁？“会不会是到废品收购站的人呢？”她惊叫起来，我看她的脸都吓白了。

武斗开始了，砰砰乓乓不时传来枪声。母亲叮嘱我们，不要随便上街以免误中流弹。晚上睡觉时也要用一床棉被挂在窗户上，似乎这床棉被就可以起到防弹的作用。形势越来越紧张，隔壁的高中生莲英在市中心附近中了流弹，所幸子弹击中的是右胳膊的肌肉，并没有骨伤，好在她的父亲又是医生，当周医生从莲英的胳膊里取出子弹头时，我们都围过去看，据周医生说这颗子弹已没什么力气，否则不会留在莲英的胳膊里。接著，又听说有人晚上去上公厕时给枪打死。同学竹英的父亲下夜班回家途中，误中枪弹，还没来得及送医院就去世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竹英母亲伤心欲绝的神态。一直到许多年后，竹英的母亲走路时都是小心翼翼地紧紧靠著墙根，生怕哪里再飞来一颗无名的子弹，无端地夺去她的生命。

谭力夫的血统论从北京传到了地方，从大学传到了小学。我们所在的边远省份的一所普通小学里，也开始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革前的少先队已由红小兵取代，在时兴的选红小兵的班长，连长，学毛著积极分子和其它所有活动中都已没有我的份。我所在的工人新村小学是以工人子弟为主，而在我们班里，并没有什么地富或资本家的后代，像我这样的旧职员的子女便成了凤毛麟角，再加上文革前做过两年的班主任，俨然成了刘少奇在班里的代理人，变成众人发难的对象。以前常在一起玩的一些女生，也有意无意地躲著我，好像我有传染病似的。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则常向我吐口水，扔石头，以脏话辱骂。有次我去买酱油，路过学校门口，被一位工人出身的男生拦住，他义愤填膺指著我的鼻子，大声喝斥：“小烂屎（当地方言，小婊子的意思），你说你家是下中农的成份，明明是上中农，你敢伪造成份？”我一脸愕然，因为每次填表，问过父母成份怎么填，他们都说填职员就行了，忽然飞出一个下中农与上中农之争，令我莫名其妙。

后来，这种栽赃的故事越来越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次去乡下劳动，老师要求同学们不偷吃生蚕豆，那是生产队的财产。当几个偷吃蚕豆的男生给老师抓住后，他们非说是看见我偷吃以后他们才吃的。无论我如何流著眼泪向老师申辩，她都不理，还一本正经的样子：“这么多的人都说你偷吃了，你还狡辩什么？明天拿两角钱交到学校，算罚款。”明显地讨好这些工人子弟。我只好忍屈含冤，回家骗外婆说学校里有活动要交两角钱，把钱交到学校。班上有俩位从农村来的女同学因长了癞痢头，剃了光头不好看，戴著帽子到学校，一些调皮的男生就以抢她俩的

帽子取乐，那段时间她俩也经常眼泪汪汪的，不想上学。后来家长告到学校，班主任在课堂上宣布不准欺负这两位贫下中农的后代，在校内再没人敢扔她俩的帽子。一次放学后，大家聚在学校门口准备用零钱买杨梅吃，我也在场，一些男生又手痒，开始去抢她俩的帽子，在场的另一位女生立即冲进学校告发这些男生，班主任闻风而至，把在场的同学都叫到办公室，这些男生一口咬定是我叫他们干的，老师当面问那位报告的女生，是不是我让这些男生干的？她迟疑了一下，然后坚定的点了点头。老师一定要我向这两位戴著帽子的女同学道歉，我真是百口莫辩，委屈死了。

那些大约是在小学三、四年级发生的事，其实男生欺负女生是常有的事，在那个是非不分的年代，这些故事后面都带有家庭背景的烙印，像我这样非红五类出身的孩子常常成了受气包，谁都可以泼污水。我一直弄不明白在许多场合下，班主任明明看见那些学习很差，品行低劣的男同学嘲笑，辱骂，甚至用一些下流的顺口溜起哄我，她在一旁装聋作哑，有时还会会意地微笑。由于她的放纵和默许，班里一部份男生一直跟我过不去，如果其它男生不去附和，在下次的顺口溜里便会和我并列在一起。在班里风平浪静的时候，班主任会显得很习惯，然后由她莫名其妙地挑起一个话题，将全班的注意力不断地集中到我身上，让我一直成为众人的焦点。

最恶劣的事件是在一次铲土、挑土的劳动中。由于我的特殊身份，我自觉积极肯干的欲望就特别强，特别地卖力，生怕予人口实。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吃饭时间，我刚坐下来打开饭盒，班主任开口了：“X X你今天劳动表现不好，再干一会儿再吃！”我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一人拿起铲子，一边流泪一边铲土。那次倒是很安静，连平时那些我认为最可恨的男生也没出声，大家实在是太累太饿了。过了一会，女生黎霞站起来说：“老师，她今天劳动表现很好啊，我可以证明，应该让她吃饭。”另一位女生凡惠也站起来说：“老师，我也可以证明。”老师显得很尴尬，只好下台阶：“好吧，你现在可以去吃饭。”我已完全没有食欲，抱住双膝坐在田埂上默默地流泪。

那天下午，我的忿怒已无法控制住，我决心反抗。在收工后集合排队准备步行回家的时候，借上厕所的机会，我偷偷向中午勇敢站出来帮我说话的黎霞和凡惠讲：“我要找辆车回家，老师这样整我，实在太过份了！”她俩很同情：“就是嘛，老师怎么会这样对你？我们跟你一起走。”在她俩的同情和支持下，我更加义无反顾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劳动的地方离家很远，步行至少要走两小时左右。我们三人悄悄离开队伍，溜到马路上，开始向过往的车辆频频挥手，要求免费搭车。终于，一位小型三轮机动车的司机发了善心，将车速减慢，车上的两位大人也帮忙把我们三人拖上车。可以想像，老师在清点人数时没找到我们的焦急和气恼。当时我坐在车上心里很是痛快。次日，我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学校，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在等著我，出乎意料，她只是说：“你必须对你们三人的行为负责任！”口气也不如以前那么硬了。

我一直都弄不明白，为什么自文革以来班主任对我的态度与文革前有了截然不同的转变？文革前，她经常表扬我，说我学习好又肯帮助人，有一次还在年级会上专门提到，班里一位女生家里很穷，冬天没有棉衣过冬，是我把自己的一件旧棉衣送给了这位女生。学校里有文艺表演时，老师也是让我去她家拿手风琴。自文革以后，她好像以前从来都不认识我似的，对我的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她自己是什么家庭成份，我不知道，但听说她的丈夫是解放前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毕业生，因为成份不好，只能在中学里做一些清洁工作，或写写标语等杂活，是所谓被控制使用的人员。我见过她的丈夫，四十出头的年纪，已是满头白发。他们有三个女儿，年纪和我相近。多少年来，我一直想不通，文革中为什么她如此不公正，不友善地对待我？想来想去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怕班里太风平浪静，学生们可能会去注意到她的言行和家庭，因此班里必须存在著一个能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对象。二是承受不了

社会对她的丈夫的不公待遇，怨气无法排遣，只好发泄到无辜的我身上。不可否认，十岁上下的我，很可能有让她不满之处，但怎么也不至于屡屡从我的痛苦中获得快感。她不仅是一位做母亲的成年人，也是我人生受教育的第一位老师，我永远也找不到能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童年，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黄金时代，我们却是在充满歧视，谎言，诬陷，屈辱，惶恐，趋炎附势，以强凛弱，愚昧中挣扎过来的。

□ 原载《多维新闻网》

~~~~~

【历史资料】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的来信及毛泽东的批语

〔编者说明：这封来信是寄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刊登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一份《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毛泽东的批语手写在第九号简报上。〕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因此更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的衣着来看，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可能的话）把他们同蒋介石的走狗区别开来。精致的白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的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二辆麦尔采得一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这难道真有必要吗？由于这一鲜明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且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件事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致以同志的敬意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于维也纳

毛泽东的批语：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  
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

□ 原载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外事风雷》1967年9月9日

∞ ∞ ∞ ∞ ∞ ∞ ∞ ∞ ∞ ∞ ∞

四位美国在华专家的大字报及毛泽东的批语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

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

- 一、没有体力劳动；
- 二、没有思想改造；
- 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
- 四、不搞阶级斗争；
- 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

- 一、有特高生活待遇；
- 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 一、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 二、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 三、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四、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真正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 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 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 四、允许并鼓励我们密切地结合工农群众。
- 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 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 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工作人员一样。
- 八、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的批语：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 原载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外事风雷》1967年8月29日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end-cm@end.org>

---